

附錄

西安事變期間日本輿論界爆發的「中國再認識論」

—日本主要雜誌的報導分析—

序論

第一節 中國再認識論之爆發

- 一、西安事變之衝擊
- 二、以往的中國認識
- 三、轉變中的中國認識

第二節 對中國國家統一之分析

- 一、抗日救國
- 二、英國勢力與浙江財閥與之結合
- 三、統一與不安定、半封建半殖民

第三節 對中態度之調整

結論

序論

一九三六年，張學良劫持蔣中正，爆發西安事變。當年在日本，事變首謀者張學良等被視為主張積極抗日，因而日本確實成為中國須要打倒的對象。事變爆發對日本的衝擊如何？日本如何認識這個事件，如何反應這個事件？

事變爆發後，日本輿論不但立刻報導，而且也有長達三個月的追蹤報導。根據日本主要雜誌的報導，依時間順序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日本因此事件而對中國的認識有了重大轉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後，旋於同月二十二日出版的一九三七年一月號中，各雜誌均預測，南京中央政府將因此事件而失去國家領袖蔣中正，並因之再度走向軍閥割據、列強瓜分的時代。它們斷言，中國是沒有辦法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國家。可是，事實的發展卻與日本輿論的預測正好相反，南京政府不僅避免了政治危機的發生，而且實現了和平解決的方案。因此，二月號就承認了一月號的見解犯了武斷的錯誤，並進而主張有重新認識中國的必要性。三月號，則進一步提出深入認識中國的嘗試。所以，西安事變可以說是日本（輿論）重新認識中國的轉折點。這就是日本第二次大戰時期的「中國再認識論」。

那麼，日本之「中國再認識論」的意義到底在那裡？簡單來說，就是日本輿論透過西安事變，向日本社會要求如何重新認識中國。綜括而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嘗試從當時日本輿論的角度，尤其是透過四種主要雜誌（月刊）在三個月之間所輯錄的論文，來闡明「中國再認識論」的問題。因此，首先確認問題之所

在。其次，以時間順序來理解並且整理西安事變期間日本主要雜誌的論述。同時，把握日方「中國再認識論」所貫徹的主旨，即將中國視為統一國家的觀念。再者，析論日本輿論所認識之中國國家統一的原因，並探討日本輿論所認識之統一國家中國的面貌。最後，討論日本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如何調整。

扼要言之，本文乃是透過日本輿論所認識的西安事變，來解析西安事變對日本輿論，在中國認識上，歷經的轉折及其所投下的影響，用以闡釋「中國再認識論」的歷史意義。

第一節 中國再認識論之爆發

「中國」到底是甚麼？中外人士長久以來一直就考慮的問題。這也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一般而言，日本對中國的認識，第二世界大戰之前後，完全不一樣，從現在日本來看，戰前中國是分裂、混亂、不安定的國家，另外，戰後中國是統一、安定的國家。那麼，日本輿論界何時開始認定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呢？其轉折點與西安事變期間日本輿論界爆發的「中國再認識論」有甚麼關係呢？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事變發生的當日晚上，日本輿論取得世界上最早報導事變爆發的號外新聞。此外，它們也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預測事變發展。但是，西安事變的實際進展則與日本輿論所預測的進展完全不一樣。日本輿論痛感自己對中國的認識不夠深入，於是發出重新認識中國的呼聲。這是史稱「中國再認識論」之出現緣起。其目的是希望透過對中國的進一步認識來掌握中國政情的進展軌跡。本文目的就是分析日本輿論對中國重新認識的過程。

一、西安事變之衝擊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中國再認識論在日本各個主要雜誌中出現了。某雜誌二月號稱曰：

西安事件之突發，給與世人第一印象就是，「支那¹是甚麼？」、「南京政府是甚麼？」，此種疑問被重新當作問題來探討。西安事件本身對此疑問所提出的回答就是，「支那是在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過程上。而南京政府則是此事業的擔當者」。²

日本的中國再認識論所以出現的原因是，因為日本輿論反省自己不但無法正確掌握西安事變的訊息，甚至連對中國本身也無法作出正確報導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某雜誌三月號³當中，匯集了以西安事變為開端的新舊兩種不同觀點的中國認識：

¹ 原文如此，以下一樣。

² 矢內原忠雄，〈支那問題の所在〉，《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p.9。

³ 山本實彥，〈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p.225。

世人認為，若蔣介石在南京政權裡消失，則南京、上海將如亂麻一樣雜亂無章。

此是重新認識以前的舊認識（即一月號的認識），但文章隨即提到：

至少對我國人而言，大家都以為如此，但是實際上南京依然維持沉靜。（…中略…）是以，中國中央方面認為如果蔣介石不在南京，政治上、軍事上也可以應付下去，他們【中國中央方面】獲得這些自信。

這又是重新認識以後的新看法（即二月號的認識）。也就是說，在日本輿論舊認識之下，將中國視為一個混亂國家；在新認識之後，將中國則視為一個統一國家。

二、傳統的中國認識

首先，以一月號的觀點為主來探討日本輿論對中國的舊認識。西安事變爆發不久（十二月十三日）舊認識的論述，其主張如下：

至少有一段時期，毫無疑問，中國或多或少後退到國內勢力分立之狀態。此時期，亦即各國勢力之間的鬥爭與摩擦會激化的時期，因而，不容爭辯，支那的情勢成為今日世界平和極大的脅威。⁴

中國歷史將後退到「再次出現督軍割據的時代」⁵，同時也將再次出現列強爭奪霸權的時代，因此「這不是支那的國內問題」⁶。這就是日本輿論在接到西安事變爆發之後不久，所提出的今後中國之情勢預測。這些預測的基礎都是站在「支那今日依然為半殖民地，同時仍多保持封建性關係，這是其社會的特性」⁷之認識。換言之，近代以來，在認識中國之際所經常使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舊有認識，在這裡也可以清楚看到。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輿論也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認識架構之下，曾經試圖了解西安事變。

三、轉變中的中國認識

二月號的觀點就是日本輿論對中國的新認識。隨著時間的經過，西安事變的新情勢被報導出來了。據此判明了一月號對西安事變所作的預測，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二月號非常強調日本輿論對中國的認識必須要從根本上改變。它回顧著表示：

我國在接到蔣介石遭監禁的報導時，大部分的人都預測，蔣已經被殺了。假如他【蔣】不領導民國政府的話，則各省將會再次混亂，因而督軍政治也將再一次抬頭，中國經濟當然也就陷入紛亂之中。⁸

⁴ 山川均，〈張學良の叛亂 打倒蔣介石のクーデター〉，《改造》，1期（1937.01），p.106。

⁵ 山本實彥，〈張學良の叛亂 蔣介石と張學良〉，《改造》，1期（1937.01），p.104。

⁶ 山上正義，〈學良の叛亂と南京政府〉，《文藝春秋》，15卷1期（1937.01），p.174。

⁷ 尾崎秀實，〈學良兵變と支那 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 —支那社會の内部的矛盾の爆發—〉，《中央公論》，52卷1期（1937.01），p.411。

⁸ 山本實彥，〈中國の近況を報告す〉，《改造》，2期（1937.02），p.221。

預測支那將再度陷入混亂狀態的人也不少。⁹

日本輿論雖然「動員全部『支那通』」¹⁰，但是「事實與它們的預想完全相反，大局毫無動搖。」¹¹ 因此，它們說，「錯誤極大。所以，我們對中國問題，必須重新認識，因之【中國再認識論】高唱入雲。」¹²

日本輿論，首先嘗試認識南京政府，其次再重新認識中國。它表示：

我們必須要認識的是如下的事實，也就是說，蔣的拘禁期間，南京政權的統制力量證實了蔣介石雖然不在，但是其已經發展到相當好的程度。¹³

日本輿論對南京政權重新認識，不是它根據領袖蔣介石的個人統率能力，而是它根據政府組織的功能發揮。日本輿論說：

【中國】中央政府的基礎有進一步的鞏固，這是最近的觀感。如青天霹靂般的西安事變，使世界各國重新認識支那。支那國內的團結日益堅定，世界各國承認它已具備可以完成真正政治統一的資格。¹⁴

日本輿論所重新認識的中國是希求統一的中國。

日本輿論所重新認識的中國，就是以有機組織地形成的南京政權為中心，而希求國內統一之國家。

另外，從二月號之主旨，即重新認識之角度來看，則一月號即重新認識以前的所有記載，好像都是由於軍閥割據（半封建）與列強瓜分（半殖民地）的過往印象，來控制其認識中國。其實在一月號，也有認為中國是統一國家的文章，雖然它只是極少數。

至少日本外交，過去不承認支那為統一國家。但是，今日我國外交已將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視為交涉的對象，嘗試就日支問題作「全面性」解決。因此，這就是值得驚訝的形勢變化。不管交涉的結果如何，可以說，支那已經取得相當的成功，因為它已使日本承認其為統一國家之事實。¹⁵

突然喪失蔣介石，因此導致南京政府立刻瓦解。這是不可能的。¹⁶

如上引用的前者是，指日本為了解決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所宣布的廣田三原則¹⁷與同年十一月在華北實行分離工作以來，因華北問題而與南京交涉。交涉當中，發現了並且認識了統一國家中國。（當然，此論點是由於西安事變爆發，而產生的新

⁹ 太田宇之助，〈西安事變以後〉，《日本評論》，2期（1937.02），p.255。

¹⁰ 尾瀨介人，〈支那通メンタル・テスト—學良事件をめぐって—〉，《日本評論》，2期（1937.02），p.330。

¹¹ 太田宇之助，〈西安事變以後〉，《日本評論》，2期（1937.02），p.255。

¹² 山本實彥，〈中國の近況を報告す〉，《改造》，2期（1937.02），p.221。

¹³ 同上。

¹⁴ 太田宇之助，〈西安事變以後〉，《日本評論》，2期（1937.02），p.255。

¹⁵ 山川均，〈張學良の叛亂 打倒蔣介石のクーデター〉，《改造》，1期（1937.01），p.104。

¹⁶ 尾崎秀實，〈學良兵變と支那 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支那社會の内部的矛盾の爆發—〉，《中央公論》，52卷1期（1937.01），p.411。

¹⁷ 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所提出的對華要求，就是(1)停止排日，(2)承認滿洲國，(3)共同防共。

認識。)另外,後者則是,從南京政府受到浙江財閥與歐美援助的觀點來否定南京政府的急激崩壞¹⁸,這一點值得特別記載。反正,從二月號的重新認識的整個角度來看,則整個一月號記載成爲舊的看法。

第二節 對中國國家統一之分析

日本輿論面臨西安事變的衝擊,不得不改變自己對中國認識,掀起中國再認識論,重新認識南京政府爲主導中國統一的事實。日本輿論將此一過程如何解釋?根據某一報導:

雖然蔣介石遭到長期監禁,但國民政府就是泰然自若。(…中略…)「重新認識中國」卻高唱入雲。中國為何會在如此短時期之內,確立統制力量。¹⁹這裡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國內爲甚麼會維持統一,另外一個是南京政府爲甚麼會被視爲中央政府。日本輿論對此疑問似乎也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中國國內是因「抗日」這一所設定的目標而實現國內統一,南京政權則是在浙江財閥與英國的「援助」之下,確立中央政府的地位。至於日本輿論所說的「抗日」與「援助」又是甚麼意思?本文擬對此作必要的分析。

一、抗日救國

日本輿論斷言,貫徹中國全土的抗日意識,只是中國當政者爲了統一國內所提出來的政治口號而已。

「南京政權爲了與英美法或者蘇聯等維持既有的關係,應該無法摘下抗日的招牌,況且又爲了維持現在的國民眾望,也不得不標榜抗日,這就是悲哀的現勢。」(東朝²⁰,元旦)事實上,南京政權在過去一年之間特別擴大其勢力範圍,此驚人的成就之理由,是標榜抗日救國,企圖將一切國內問題結合於此點,並且集中而強行。²¹

此記載是首先引用東京朝日新聞所揭載的近衛²²之言論,然後加以對之贊同的評論,說明在中國的抗日主張只是當政者爲了國內統一而提出的有政治意圖之標榜。

也就是說,對日本輿論而言,中國抗日聲勢高漲的原因是,因爲「最近一、二年,在中華民國,統一國民的意向之際,或者統一黨部的意見之際,都是將日本當作對象,將日本看作敵國,進行出謀劃策。」²³

¹⁸ 尾崎秀實,〈學良兵變と支那 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支那社會の内部的矛盾の爆發—〉,《中央公論》,52卷1期(1937.01),p.411。

¹⁹ 山本實彥,〈中國の近況を報告す〉,《改造》,2期(1937.02),p.204。

²⁰ 東京朝日新聞。

²¹ 藤枝丈夫,〈國民政府の新動向〉,《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p.149。

²² 原文是「近衛公」。「近衛文磨」之意?

²³ 山本實彥,〈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p.217。

國民黨部也是，中央政府也是，兩廣政府也是，舊東北軍殘黨也是，共產黨也是，共同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半殖民地狀態，加強民族團結，完成國家統一，而使用排日、抗日這一工具是很方便，的確也在實際上取得了它的效果。²⁴

總之，日本輿論認為，中國政府的抗日目的為「先安內後攘外」，因此不在於真正實現抗日，而在於為了國內統一，抗日只是當政者正當化自己的大義名分而已。日本輿論稱：標榜抗日的政策，「對民國而言，雖然很方便，但是無法永遠將之當招牌掛著」²⁵。日本輿論界認為，中國如果立刻實行抗日政策而與日本打仗，則中國絕對是敗北的。因此它們又說：

【暗中允諾張學良立刻抗日要求的】蔣介石即使留任軍事委員長，也不可能即刻與日本打仗。不但支持蔣的宋、孔²⁶集團也是，即使其背後的浙江財閥也是，看不出有立刻與日本斷絕政治關係之意。²⁷

基此，日本輿論乃否定中國有即刻抗日（即刻對日開戰）之可能性。日本輿論又進一步推定中國因為國力不足所以無法即刻抗日。雖然它們一方面認識到「中國近幾年表現了驚人的統制力」，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又認為「有關軍事上的事情，從公平的角度來看，中國是無法與我國抗衡的」²⁸。

因之日本輿論指出，如何處理抗日就是南京政府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稱：即使全國性抗日問題，萬一有一步之誤，則雖【中國】有全國統一但也有瓦解之虞。中國如果與日本立刻開戰，就會招來敗北，就蔣介石而言，他本人比誰都清楚此事。但是，現在的中國政情，一定不容許蔣表現此種態度並公開宣布。²⁹

日本輿論注意到南京政府今後對於抗日問題處理得妥善與否，將會影響該政府統一全國的瓦解與否。因此，它們指出南京政府具有不安定性。日本輿論批評，全國性抗日過於高漲就導致當政者也絕對「無法正面反對抗日運動，因為【抗日趨勢】已經擴大到整個國民的規模」³⁰。

所以，日本輿論認定，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是利用南京政府「無法正面反對抗日」的大義名分，並利用這一弱點來攻擊南京政府。

日本輿論認為，中共不斷的展開抗日運動是說：

對於其抗日的具體性成果，從今日的觀點來看，仍然沒有脫離止於宣傳煽

²⁴ 同上。

²⁵ 同上。

²⁶ 宋子文與孔祥熙

²⁷ 山本實彥，〈中國の近況を報告す〉，《改造》，2期（1937.02），p.207。

²⁸ 同上。

²⁹ 山本實彥，〈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p.216。

³⁰ 藤枝丈夫，〈【特輯】非常時支那讀本—抗日の核心 中國共產黨—〉，《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p.226。

動之範圍。因此可說，對日本而言，好像從頭到尾都沒有對日本造成甚麼具體的脅威。只是一些空話與擺樣子而已。³¹

此外，它們又說：

共產黨提倡組織抗日聯軍以及國防政府，乃是為了否定國民黨政府。³²

雖然如此，實際上中共在國內保持有一些影響力量。日本輿論認為，因為中共與「共鳴抗日而且企求打倒軍閥控制的土著農民之間，有公然或非公然支持的關係，甚至於還將其同情者擴大到國民黨統治下的各個階層」³³，所以中共用抗日運動的名義來才可以繼續擴大其活動，「而且他們【國民政府】也不願意在此一運動【抗日運動】上與共產黨正面衝突」³⁴。

日本輿論指出：

如果南京政權擬今後真正的繼續其掃匪工作，那麼比起武裝與軍費的充實或任何其他，首先最重要的應是破壞抗日人民戰線或者將此戰線從共產黨分離出來。若此事不能，【其繼續工作】便將遭遇極大的困難。³⁵

日本輿論又分析中國國內此種對立狀況而且預測，一是國民政府的「不抗日、不親日、反共、然後又在背後磨拳擦掌企圖對日報復之劍」，另一則是中共的「驅使大眾參與容共抗日的人民戰線派」，國共雙方「此兩潮流雖然是激烈反撥，但是控制中國政局進展的動向」。因此日本輿論主張國共對立的解決相當不容易。³⁶

結果，日本輿論判斷，中國目前成功的統一國內是因為中國標榜抗日，但是目下卻沒有打算實現它，因此它也會引發弊害，那就是中共不但能主導抗日人民戰線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的勢力，而且可以今後長久地存在，進而讓國內招來不安定主要因素。根據以上的分析，日本輿論所認識的中國，可以說是，不安定的統一國家。

二、英國勢力與浙江財閥與之結合

日本輿論所認識的中國，其面貌就是，以內政為主，標榜抗日，勉強達成國內統一的國家。至於在它所統一的中國國內，南京政府為甚麼會確立其指導性地位、中心性地位，另外，南京政府是否確實放棄將來實現真正的抗日，日本輿論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呢？日本輿論提出的答案是，南京政府立基於英國的支援與浙江財閥的經濟力來確立了中國中央政府的地位，也因此南京政府企圖利用此援助與經濟力量而實施真正抗日。

³¹ 同上，p.222。

³² 同上，p.226。

³³ 同上，p.225。

³⁴ 同上，p.226。

³⁵ 同上。

³⁶ 梨本祐平，〈英國の勝利と日本の窮迫—支那問題の一項目として—〉，《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p.163。

一九三五年以英國為中心實施的幣制改革，而且尤其是西安事變之際端納（Donald, William Henry, 1875—1946）³⁷與宋子文聯手救出蔣中正一事，讓日本輿論加強認識英國的對華影響力乃是透過浙江財閥來援助南京國民政府。

幣制改革當中，Leith-Ross³⁸為中心而努力之後，英國迅速對中國支配階級給與極大的歡喜。雖然端納不能獲得南京政權某些人的歡迎，但是一般而言，防止中國的動亂於未然，就是在端納以及宋子文背後的英國資本財閥。因此英國對中支、南支³⁹的高層階級很好。然後英國與宋蔣財閥結合唯一無二的關係。⁴⁰

【宋子文偕同端納赴西安救出蔣中正，國權派對此非難而說，為了救出蔣，宋甚至同伴外國人。】但是大部分的中國人對端納以及英國官憲非常感謝。因此華英之間成為非常緊密的關係。⁴¹

日本輿論，對英國與浙江財閥支援南京政府保持冷淡的態度稱：

浙江財閥在此次事變中，決定始終支持【南京政府】，對保有莫大公債的財閥而言，毋寧是當然之事。（…中略…）加強財閥的霸權，這就是增加其財閥與政權內部的非資本家因素之間的摩擦，而且絕對不含有所減弱，反而，其霸權為了確立或者強化，將比現在伴隨【其財閥】並且從屬於歐美資本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而，國民政府愈具備名目上、形式上的統一政權的型態，則愈離開本來強化的意思。⁴²

此事，「針對支那的近代性統一絕對不是貢獻」，而且，應該說，「結果不是國民政府的強化，而是從屬化」。那麼，為甚麼國民政府「接受此種援助」呢？因為「以國民政府為代表的現在支那統治階級，打算提高對日本的抗爭力」所致。⁴³日本輿論認為中國為了抗日加深從屬西方。

站在此一認識基礎上，日本輿論認為，中國「政局的進展動向是，正根據英美依存策略，而脫離像小兒病一樣的容共抗日政策，以展開實際性對日報復之途」⁴⁴，簡言之，日本輿論認為中國具有真正對日報復之意圖。

在此種認識之下，日本輿論強調主張，除了西安事變以外，「並沒有說明現代支那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在這裡所謂的半封建意味著，「支那近代金融資本家團浙江財閥，對現在支那的政治動向具有巨大的功能」，另外，所謂半殖民

³⁷ 澳洲人，原是英國雜誌《Times》的記者，後來歷任孫中山、張學良、蔣中正之顧問。西安事變當時，他是蔣中正的顧問。

³⁸ Sir Frederick W. Leith-Ross.

³⁹ 中支、南支，即中國中部、中國南部。

⁴⁰ 山本實彥，〈中國の近況を報告す〉，《改造》，2期（1937.02），pp.219-220。

⁴¹ 山本實彥，〈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2），p.226。

⁴² 藤枝丈夫，〈國民政府の新動向〉，《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p.150。

⁴³ 同上。

⁴⁴ 梨本祐平，〈英國の勝利と日本の窮迫—支那問題の一項目として—〉，《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p.164。

地則意味著，「對支那最大投資者英國，在中國具有地位崇高的發言權」。⁴⁵ 因而，此種認識決不意味著軍閥割據與列強瓜分之過去的意思之半封建半殖民地。在這裡必須注意的是，因西安事變而引發的中國再認識論中，日本輿論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涵義已經不同於以往的意義，它已經轉變意思了。

三、統一與不安定、半封建半殖民

首先，中國因主張抗日而實現國內統一，再加上南京政府在英國與浙江財閥的支援之下確立其主導權並且準備政府官方的真正抗日。日本輿論根據如上對華認識架構，來對中國加以定義，即中國為一個不安定而且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統一國家。可是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同時又作為一個不安定、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這是怎麼樣的國家呢？日本輿論對這樣的認識，到底如何加以整合性。

日本評論家表示：

蔣介石雖然被監禁，但是在財政上、政治上並沒有破裂，所以我的確向國人【日本人】講過必須要改變對民國的認識。但是，我只有說它是作為一個形態的國家，沒有說它是作為完全的近代性國家。⁴⁶

根據此評論家的說法，透過浙江財閥獲取英國對華支援，將會弱化中國的政治力、財政力，也就是弱化民族資本。

蔣政權也許根據那些上部力量來強化自己。但是從國力的角度來看，則會漸漸衰弱，也就是說，進一步深化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⁴⁷

他又繼續強調：

對國家而言，進行某些形態的做法是病態的。這與蔣君及汪君⁴⁸所說的自力完全走向相反的方向。⁴⁹

所以，他除了指出振興學術的必要性⁵⁰之外，呼籲中國真正必要的是農村改革：

決定中國是否能夠成為近代國家的是，與其充實軍備，不如解決農村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斷然實行農業改革的問題。⁵¹

最後他下結論斷言：

若準備將民族導向民族鬥爭，則該民族必將陷入塗炭困難的境地。⁵²

那麼日本輿論到底如何綜合認識中國的各種各樣問題？

認識支那正在向民族國家的統一建設邁進中。【其】重點就在於此。⁵³

⁴⁵ 樋口弘，〈列國對支投資の新動向—英米佛は支那に何をなさんとするか—〉，《中央公論》，52卷3期（1937.03），p.39。

⁴⁶ 山本實彥，〈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p.219。

⁴⁷ 同上。

⁴⁸ 蔣中正與汪兆銘。

⁴⁹ 山本實彥，〈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p.219。

⁵⁰ 同上，pp.221-223。

⁵¹ 同上，p.220。

⁵² 同上，p.223。

國民政府雖然有其一切的弱點，但是它已成為支那的唯一政府，支那的唯一指導者，然後因此促進支那的統一化，其統一也已經到了即將完成的階段。我們認識此一事實。這是支那的方向，也是現實，也是現在的階段。⁵⁴ 總之，中國是由南京政府來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日本輿論認識中國現狀所持的基本立場。尤其如上引用的後者論點，是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號的雜誌上一所謂對中國的舊認識之下一所記載的。

西安事變後不久，日本輿論所認識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關於這個疑問，根據上述的分析論證，進而加以整理，就可以用表格表現如下：

A	B	C
過去	一九三七年冬當時	未來
中國再認識之前	中國再認識之後	
列強瓜分 軍閥割據	英國援助 浙江財閥援助	民族的 近代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		民族國家
混亂國家	統一國家（南京中央政府）	
	形式上的 統一國家 （抗日標榜）	完全的 統一國家
不安定		安定

羅馬字母A、B、C是，從中國再認識論高唱入雲之時（一九三七年冬一、二月）的日本輿論的觀點而分類過去、現在（一九三七年冬當時）、未來的三種對中國認識，其時間順序是從A到C的經過。

A時代的中國是，「過去的中國」，也是中國再認識論之前的舊認識之下所認定的中國。列強瓜分中國，軍閥到處割據，即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時代。它被視為是混亂而且不安定的國家。

B時代的中國是，「當時的中國（西安事變之後不久的一九三七年冬）」，就是中國再認識論之後的新認識之下所認定的中國。南京政府因標榜抗日而勉強成就形式上之統一國家，國內還不安定。但現實上，它仍在進行而沒完成終極性的統一。它是為了達成其所希求的國家統一目標，而且為了準備政府官方的真正抗日，受到英國與浙江財閥的援助。因此，日本輿論認為它是一個統一卻不安定半封建

⁵³ 矢內原忠雄，〈支那問題の所在〉，《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p.17。

⁵⁴ 室伏高信，〈張學良クーデター事件 學良事件と中國及び日本〉，《日本評論》，1期（1937.01），p.8。

半殖民地之國家。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半封建半殖民地，其意思與過去的意思不一樣。要之中國還不是真正的民族國家。

C時代的中國是，未來的中國，也是目前中國所期盼的國家形態。乃所謂近代的、民族的統一國家。日本輿論的國家觀念認為，真正的統一國家，一定是近代民族國家，具有此種條件，國家才能安定。在日本輿論認識之下，當時的中國還沒有達到這種國家形態，甚至可能無法達成。

支那本身的發展法則是統一志向。但這不一定成為實現統一的終極保證。⁵⁵

總之，西安事變之後的日本輿論所重新認識的中國是，如果根據上記圖表的話，當時的中國是處於B的狀態，也就是說：

- (1)中國雖然標榜抗日，但是它在形式上是已經統一國內的狀態，
- (2)主導國家的南京政府，因為從特定的團體與國家（浙江財閥與英國）接受援助，所以認定中國（南京中央政府）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雖然如此，它仍處於統一國家的狀態，
- (3)為了擺脫現在的不安定狀態，中國（南京中央政府）追求更安定的終極性近代民族國家統一之狀態。

日本輿論的中國再認識論，就是重新認識當時的中國是處於B狀態之下。另外，應該注意的是，日本輿論對西安事變之後不久的中國認識是處於B狀態之下，對A、B狀態都同樣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這個概念。

支那是，作為殖民地，即作為商品的販路，對資本家而言，它不斷成為重大的注意以及興趣的對象所在。但是，從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來看的話，它沒有東西足以吸引日本知識份子去感到興趣。⁵⁶

由於日本輿論具有這種基本觀點，日本輿論將當時的中國與過去的中國加以區分，一方面將其當時視為統一國家，將其過去作為混亂國家來加以區別並作出認識，但是，另一方面又將其當時並沒有跟其過去中國作出區別，依然認定中國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反正，總結來說，日本（輿論）認識中國為統一國家，這就是日本之中國再認識論的歷史意義。所以說，西安事變是日本（輿論）重新認識中國的轉折點。

第三節 對中態度之調整

日本輿論所認識的中國雖然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但在形式上它已是統一國家，兼以它希求終極性近代民族國家統一之狀態。既然這樣，日本輿論如何重新調整對待中國的態度呢？

⁵⁵ 山川均，〈張學良の叛亂 打倒蔣介石のクーデター〉，《改造》，1期（1937.01），p.106。

⁵⁶ 尾瀨介人，〈支那通メンタル・テスト—學良事件をめぐって—〉，《日本評論》，2期（1937.02），p.330。

日本輿論說：

我們重新認識支那以處理新的事態，藉以重新開闢日支雙方幸運之途。⁵⁷所謂中日雙方幸運之途，將之從當時的情況來推測其具體意思，就意味著中日經濟依存關係的確立。

在確立牽連日鮮滿的準戰時經濟體制上，此【日中兩國】經濟體制的依存關係，一定是緊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條件。⁵⁸

換言之，「以安定東亞勢力為己任的日本」⁵⁹為了準備將來與蘇聯開戰，打算確立將日本、朝鮮、滿洲國聯合起來的準戰時經濟體制。為了確立其體制，日本需要建立與中國（特別是華北）經濟的依存關係。在此種狀況之下，日本輿論才提出中國再認識論。

在此，我們為了進而了解西安事變之後不久的中日關係，必須進而討論中國再認識論與中日經濟提攜之間的關係。關於當時的中日經濟依存關係，根據既存研究，其情況如下：

在一九三六年底，以新聞界及政黨中的自由勢力為中心，根據中國的國民政府之統一進展，要求自從來的軍事侵略路線轉變為「經濟提攜」路線的聲音逐漸高漲，在既成政黨方面，此既構成廣田內閣倒閣運動中的一個極重要的潮流。⁶⁰

簡言之，日本輿論界對中國再認識的意義是，從軍事侵略路線轉換成經濟提攜路線。的確，關於經濟提攜的可能性，實際上，當時也有一些主張和平的意見。

但是，我相信拯救日華國交的路線非常多，而且我知道只要我們的態度謙虛，它不一定是至難的工作。⁶¹

對支那大勢發展的正確方向，給與指導與援助，然後使【中國】達成之。於是將日支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加以組織運行，則日本的新對支政策的要點就在於此。（…中略…）今日支那的滔滔大勢在於建設近代統一國家。強化對支那的統一國家建設，並給與道義支持，而且在其【中國領土】範圍之內將北支那的特殊性加以組織運行。在南京交涉之際所表現過的這個日本對支方針，我相信在其根本並沒有錯誤的。⁶²

⁵⁷ 平貞藏，〈南京政權と抗日外交〉，《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p.104。

⁵⁸ 梨本祐平，〈英國の勝利と日本の窮迫—支那問題の一項目として—〉，《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p.164。

⁵⁹ 同上。

⁶⁰ 日本外務省檔案，〈西安事變參考資料及調書〉，A6-1-5-10-4，轉引自中村義，〈西安事件と日本の對應—尾崎秀實の周邊—〉，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尾崎秀實の中國研究》（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83年），pp.92-93，再轉引自許育銘，〈西安事變時期日本之輿論反應〉，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台北縣新店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7年），p.305。

⁶¹ 山本實彦，〈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p.226。

⁶² 梨本祐平，〈英國の勝利と日本の窮迫—支那問題の一項目として—〉，《文藝春秋》，15卷2期

與此同時，也存在著跟過去相同的軍事侵略（行使實力）主張，或持以武力解決的意見。

我應該明確指出：【以西安事變為起因，如果反共態度在國民政府的政治上公然表現出來的，則國民政府採用】不抗日以及不親日的態度，也就是說，一方面是以不抗日為預防因隨便主張抗日而發生的【對日】摩擦，同時，另一方面是，不實施親日而實施嚴格反共。此成為國民政府的骨幹，其期間以多年來之打倒日本之宿志為目標而囂囂進行全神關注必死的努力，更加準備戰爭力量之充實，跟國際援助互相結合，發揮驚人的能力。⁶³

現在，熱狂的推進抗日，將會造成一如階段狀態的發展。如果是這樣——比如，如果快要超過日本靜觀其變的忍耐限度，(…中略…)就會招來與「我國大陸政策的強行方針」(元旦·東日⁶⁴)的正面衝突，這是明白可見的。今年就是對支關係表示最高程度緊張的歷史之年。⁶⁵

總之，日本輿論透過中國再認識論，有了中國是統一國家的共識之下，認識了中日和平的道路，同時，也認識了不久將來中日將不可避免的走向武力對立。

因而，本文從日本輿論—四種主要雜誌—之主張來判斷，一九三七年冬天（一、二月）之際中日兩國將來是否會發生武力衝突⁶⁶或者走向和平提攜，是無法預測的，因此可言，這就是中國再認識論所帶來的重大歷史意義。對於日本輿論的中國再認識論，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高官⁶⁷曾有如下記載：

日人對華觀念陝變⁶⁸發生，少有轉變，彼見中國秩序如常，金融安定，始知中國愛國者甚多，雖然有困難，愈形團結，加以英、美援助，故遭空前事變未至瓦解，對中國人不敢輕視，且痛詆日政府對華觀察錯誤者，頗不乏人。又因中國人在綏遠作戰異常英勇，若中、日開戰，日軍必有犧牲，加以近日容共抗日之聲浪漸高，果成事實，中、俄兩國皆為日本之敵，軍部雖驕，不能不有顧慮，已有提議改對我方針，採用柔軟手段，以排俄防共為條件，不反對國民政府者，東京政府確有暫不擾亂華北之意。⁶⁹

西安事變爆發之後在日本出現了中國再認識論。到底是因日本人而重新認識

(1937.02), p.164。

⁶³ 同上, p.162。

⁶⁴ 東京日日新聞。

⁶⁵ 藤枝丈夫,〈【特輯】非常時支那讀本—抗日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 p.226。

⁶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為蘆溝橋事件。

⁶⁷ 東京駐日使館參事丁紹級。

⁶⁸ 在陝西省的事變,即西安事變。

⁶⁹ 〈駐日大使館丁紹級致外交部電—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4) 蘆溝橋事變前後》的中日外交關係(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p.87轉引自許育銘,〈西安事變時期日本之輿論反應〉,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台北縣新店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7年),p.307。

到的中國，還是因中國人而認識到的日本人所重新認識的中國，哪個才能表現出西安事變後不久當時中國的「真」面貌，是一饒富興趣的問題，但因不是本文的探究主題，所以留待將來討論。

結論

中國是甚麼樣的國家，近現代中國又是甚麼樣的國家，尤其是西安事變結束不久之後的中國又是甚麼形態的國家。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如何認識中國這個國家？西安事變發生不久在日本爆發的「中國再認識論」，它在日本對中國認識的歷史上有怎樣的意義？

本文經由分析日本的輿論報導—四種主要雜誌—的觀點而闡明如下：首先，探討西安事變時期日本輿論界發生的中國再認識論之緣由過程，然後把握了日本輿論對中國的新認識，即中國為統一國家。其次，對於中國國家統一加以了深入討論，明白其統一的原因，即標榜抗日，接受浙江財閥與英國之援助。然後明確了從日本輿論的角度來看的當時中國的面貌，即既是統一，又是不安定、半封建半殖民國家。最後，探討了日本輿論經過中國再認識論，如何調整對中國的態度，確認了一九三七年冬日本輿論界，對武力衝突以及和平提攜兩者主張都存在。

歸納言之，日本輿論的中國再認識論，其歷史意義在於如下二點。其一，西安事變之後的日本輿論對中國重新認識，大致可分三點。第一，中國雖然提出抗日主張，但是它在形式上已經是國內統一的狀態。第二，指導國家大政的南京政府，因為從特定的團體與國家（浙江財閥與英國）接受援助，所以日本輿論認定它只是一個不安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如此，中國（南京中央政府）卻已屬於統一國家的狀態。第三，為了擺脫現在的不安定狀態，中國（南京中央政府）追求更安定的終極性近代民族國家的統一狀態。要之，中國再認識論使日本輿論認識中國為統一國家（雖然統一並沒有全部完成）。因而，西安事變可以說是日本輿論重新認識中國的轉折點。

其二，一九三七年冬（一、二月間），當時日本輿論根據重新認識將中國定位為統一國家，而調整對中國的態度，它們體認到今後中日兩國提發生武力衝突或者和平提攜，已愈來愈難以預料。

基本文獻

1、《中央公論》（東京：中央公論社，1937年1-3月），第52卷：1-3月號。

尾崎秀實，〈學良兵變と支那 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支那社會の内部的矛盾の爆發—〉，《中央公論》，52卷1期（1937.01）。

矢內原忠雄，〈支那問題の所在〉，《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

平貞藏，〈南京政權と抗日外交〉，《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

藤枝丈夫〈【特輯】非常時支那讀本—抗日の核心 中國共產黨—〉《中央公論》52卷2期(1937.02)。

樋口弘〈列國對支投資の新動向—英米佛は支那に何をなさんとするか—〉《中央公論》,52卷3期(1937.03)。

——等15篇相關論文。

2、《日本評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37年1-3月)，1-3月號。

室伏高信，〈張學良クーデター事件 學良事件と中國及び日本〉，《日本評論》，1期(1937.01)。

太田宇之助，〈西安事變以後〉，《日本評論》，2期(1937.02)。

尾瀨介人，〈支那通メンタル・テスト—學良事件をめぐる—〉，《日本評論》，2期(1937.02)。

——等10篇相關論文。

3、《文藝春秋》(東京：文藝春秋，1937年1-2月)，第15卷：1-2月號。

山上正義，〈學良の叛亂と南京政府〉，《文藝春秋》，15卷1期(1937.01)。

藤枝丈夫，〈國民政府の新動向〉，《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

梨本祐平，〈英國の勝利と日本の窮迫—支那問題の一項目として—〉，《文藝春秋》，15卷2期(1937.02)。

——等5篇相關論文。

4、《改造》(東京：改造社，1937年1-3月)，1-3月號。

山川均，〈張學良の叛亂 打倒蔣介石のクーデター〉，《改造》，1期(1937.01)。

山本實彦，〈張學良の叛亂 蔣介石と張學良〉，《改造》，1期(1937.01)。

山本實彦，〈中國の近況を報告す〉，《改造》，2期(1937.02)。

山本實彦，〈蔣介石政權の將來性〉，《改造》，3期(1937.03)。

——等8篇相關論文。

5、其他

許育銘，〈西安事變時期日本之輿論反應〉，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19輯〕，台北縣新店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7。